

# 古典希腊劳作与闲暇观念的政治解读

王云

( 济南大学 历史与文化产业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22 )

**内容摘要:** 古典希腊的劳作与闲暇观念是由贵族系统地进行阐释的, 它们被掺进了阶级利益, 成了贵族为应对民主制的压力而树起的一道屏障; 但这种贵族针对民主制的“进犯”而采取的防卫措施, 却被现代的不少闲暇学研究和哲学家作为文化层面希腊人对劳动的厌恶而传输给了我们; 闲暇的确是古典希腊人的文化理想, 但大多数公民并未视劳作为奴性的、有辱人格之事; 劳作与闲暇在道德层面是相容的。

**关键词:** 古典希腊; 雅典; 劳作; 闲暇; 政治化

**中图分类号:** B50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804(2011)02-0029-07

闲暇学、哲学等研究领域惯常采用如下习见: 即古希腊公民崇尚闲暇厌恶劳作, 视劳作为奴性的有辱人格之事。典型的看法例如莫斯认为对希腊人而言, “劳作无非是一种诅咒”<sup>[1]</sup>。克劳斯认为“对雅典人来说, 劳作是卑贱的, 是刻板 and 令人厌倦的。”<sup>[2]</sup>塞瑟姆斯主张在希腊人眼里, “劳作是自由人应当逃避的一种责任”, “劳作……被视同敌人且应由奴隶来完成。”<sup>[3]</sup>李仲广等认为, 古希腊人视工作为“应该回避的某种不得不应付的物质上的苦役, 只有傻瓜才会选择去工作”<sup>[4]</sup>。黄爱华主张, “希腊公民过着一种有闲生活, 劳动被认为是失去尊严, 它属于奴隶等级。”<sup>[5]</sup>王国坛说, “城邦中的公民通常自己不劳动, 甚至厌恶劳动, 他们的闲暇生活是由奴隶劳动来支撑的”<sup>[6]</sup>。诸如此类, 不胜枚举。由是可见, “希腊公民厌恶劳作崇尚闲暇”的认识在闲暇学、哲学等领域里是普遍存在着的。

而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贵族知识分子的著述来看, 似乎古典雅典时期(前5和前4世纪)也确实流行着褒扬闲暇贬抑劳作这样一股思想潮流。那么古典希腊果真崇尚闲暇厌恶劳作吗? 贵族的劳作与闲暇话语背后的隐含意义是什么? 事实上古典雅典普通公民的劳作与闲暇观念又是怎样的呢?

## 一、古典希腊的社会政治环境

古代希腊尤其古典雅典所形成的劳作与闲暇观念对西方社会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而任何思想观念的产生都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环境, 这里有必要首

先对与雅典人的劳作与闲暇观念密切相关的雅典社会的政治环境作一简要分析。

雅典是领土面积最大的一个希腊城邦。关于“城邦”, 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一般来说, 城邦包含着城市、公民、国家等多个要素, 但其本质要素是公民。就是说, 城邦首先是指人而不是诸如城市之类的物<sup>[7]</sup>。前413年, 尼西阿斯激励他的军队说: “你们想一想, 你们自己无论到什么地方住下来, 就已经是一个城市……须知城邦就是人, 而不是城墙也不是没有人的船舰。”<sup>[8]624-625</sup>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 雅典城邦在精神方面和社会道德方面也在不断进步, 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全体公民共同信奉的价值观念和理想<sup>[9]</sup>。城邦民主政治是雅典人获得公认的优良生活的制度保障, 而要过上优良的和富有意义的生活, 就需要参与到城邦活动中去, 需要取得城邦成员资格。

我们知道, 雅典在民主政治制度确立以前曾经历了很长时期的贵族政治, 只有富有和贵族出身的人才能享有公民权。可以说, 民主政治正是源于平民对贵族专治的不满和反抗。前594年, 在平民和贵族的矛盾尖锐化即将引发内战之际, 执政官梭伦进行了重大改革, 消灭了债务奴隶制, 打破了贵族对政权的垄断, 重新配置了国家权力。梭伦改革是平民反对贵族斗争的一次重大胜利, 奠定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基础。前509年的克利斯提尼改革使雅典的政治生活进一步民主化。克利斯提尼改革的关键是提出了抽签选举, 容许所有男性公民包括穷人参加选举。伯里克利时代各级官职向一切公民开放, 实行公薪

收稿日期: 2010-04-23

作者简介: 王云(1972—), 女, 吉林集安人, 博士, 副教授, 从事古代希腊罗马史研究。

制和补贴制,使雅典政治达到在古代奴隶制条件下最民主的程度。只要符合公民身份的标准,最贫穷的和最富有的人就都可以享受全部城邦生活,实现了古希腊人“轮番而治”,这既是统治者的思想,也是被统治者的思想。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以前,成为公民的基本条件是生父为公民。以后随着公民人数的增多,雅典开始担心更多的“其他人”会分享他们的特权,使得伯里克利在前451至前450年进行了“父母双方均为公民才可成为公民”的公民权改革<sup>[10]</sup>。

可以说,贵族与普通公民之间的斗争和冲突贯穿雅典城邦政治生活的始终。柏拉图指出,“无论什么样的国家,都分成相互敌对的两个部分,一为穷人的,一为富人的”<sup>[11]137</sup>。据亚里士多德所言,长期以来贵族与普通民众之间就有斗争,因为在民主制之前雅典是寡头政治,“贫民本身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事实上都成为富人的奴隶”<sup>[12]</sup>。普通民众渴求政治自由和权利平等,而贵族不甘心失掉他们传统的权利和特权。毫无疑问,民主制确实给普通公民带来了自由和平等,但在贵族眼里,这种制度是低劣的、不公平的,不能给人带来真正自由和向善的生活。由是,前主人和仆人——民主制下的公民同胞们,在雅典发生了冲突。但阶级差别在总体上得到了有效处理,这样就产生了一个虽有敌意但却成功的民主制<sup>[9]</sup>。

当城邦政治斗争在十分重要的城邦成员资格问题上展开时,一些关键的概念就遭到了贵族阶级的辩驳,话语被用做谋取优势地位的武器<sup>[9]</sup>。比如,公正(dike)一词就被不同的派别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阐释。民主派认为公正即是全体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政治参与权和平等的言论自由权。在欧里庇得斯的悲剧《请愿的妇女》中,提修斯说道:“我们的城邦是自由的,它不是由一个人来统治,城邦就是自己的统治者,所有的人轮流统治。富人无特权,穷人同样有发言权。”<sup>[13]98</sup>相比之下,贵族则提倡正义等级理论。在《理想国》中,柏拉图仔细地论证了正义是立于等级制度的基础之上的,贵族在顶层,劳动民众在底层,各等级必须安守本分。柏拉图说:“如果一个人天生是一个手艺人或者一个生意人,但是由于有财富、或者能够控制选举、或者身强力壮、或者有其它这类的有利条件而又受到蛊惑怂恿,企图爬上军人等级,或者一个军人企图爬上他们不配的立法者和护国者等级,或者这几种人相互交换工具和地位,或者同一个人同时执行所有这些职务,我看你也会觉得这种交换和干涉会意味着国家的毁灭吧。”<sup>[11]156</sup>意即任何人都不能逾越等级,否则就是

破坏正义,损害城邦。由于丧失了政治特权,贵族诟病于雅典民主政治。柏拉图就曾说过,“除非天分极高的人,不从小就在一个好的环境里游戏、学习,受到好的教养,是不能成长为一个善人的。民主制度以轻薄浮躁的态度践踏所有这些理想,完全不问一个人原来是干什么的,品行如何。”<sup>[11]333</sup>他还说:“这看来是一种使人乐意的无政府状态的花哨的管理形式。在这种制度下不加区别地把一种平等给予一切人,不管他们是不是平等者。”<sup>[11]333</sup>

优秀(arete)和自由(eleutheria)的概念也在城邦政治斗争中被政治化了。贵族常常使用优秀一词来强调他们的优势,即宣称由于贵族出类拔萃的个人资质(高贵的出身、良好的教育和高尚的生活方式),贵族最适于统治城邦<sup>[14]</sup>。自由理念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基础,它包含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自由。在欧里庇得斯《请愿的妇女》中,民主派领袖提修斯的一段话就突出地体现了政治自由,他说:“我们的法律是为所有人写定的,穷人与上层富人有着同等的权力。当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时,穷人可以把高等的富人告上法庭,只要证据确凿,就可赢得官司。”<sup>[13]99</sup>而从尼西阿斯的一段话则可看出雅典的社会自由。尼西阿斯激励他的军队说,“(他们的祖国)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所有住在那里的人都有权利自由自在地按照自己的意思过自己的生活”<sup>[8]615</sup>。伍德则强调经济层面的自由,他认为民主政治的自由观念出自于农民的依附与独立的经验。农民从前依附于贵族地主,通过民主政治改革才获得了独立,农民对于解放最重要的感受就是使他们获得了为自己劳动的机会,而不再在贵族的束缚下进行劳作。因此,劳动自由是民主政治下自由观念的核心部分<sup>[15]</sup>。

作为对雅典民主政治制度下的自由理念和民众权利扩展的回应,贵族对自由的概念进行了重新阐释。贵族还把eleutherios paideia(对自由和出身高贵的人的教育)一词与闲暇、高贵的精神追求、投身公共事务以及与朋友共处联系起来,把它变成了贵族的概念,借此反对对普通劳动大众进行教育<sup>[16]</sup>。在对民主政治自由观念的辩驳中,贵族强调公民个人的素质,尤其是他们的高贵出身和所受的自由教育,贵族认为这使得他们自己是“真正自由的”。通过把更高的、更严格的标准用于自由的概念,贵族就能凸显他们自身的优势,而把普通民众说成是不自由的、放肆的和低劣的。此外,贵族还把自由同劳动区分开,认为自由是与闲暇相似的一种状态。当然,这就隐含着那些必须靠劳作来谋生的人是不自

由的。由是，话语就不仅仅是它本身的含义了，它们被掺进了阶级利益。而由于灌注了自由、优秀等要素，劳作与闲暇观念就在限定城邦生活的话语斗争中成为了主要竞技场<sup>[9]</sup>。

## 二、贵族的劳作与闲暇观念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生活在雅典的激进民主制时期。柏拉图见证了前399年他的老师苏格拉底被控、审判和处死的全过程。亚里士多德是雅典的非公民居民，因担心受到迫害而逃离了雅典，柏拉图是明确地反对民主制的，亚里士多德要更矛盾些，他承认民主制的好处，但他不信任民主制。我们有理由说，贵族的劳作与闲暇观念是他们对雅典民主政制的一种投射，也反映了贵族统治城邦的愿望。就是说，贵族建构劳作与闲暇话语体系的真正目的，是为了限定和控制城邦。

依照柏拉图的说法，人生的目标是为了发现真理，为了使德行臻于至善。他认为只有受过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才能发现真理，而只有掌握了真正的知识，一个人才有资格去组织和管理城邦。被柏拉图贴上金字标签的“哲学王”构成了公民的最好等级，其余公民被按照与灵魂诸善相应的社会劳动分工来分等安排：“辅助者”（银级）帮助和支持哲学王；第三也是最低等级（铜级）由那些从事劳动以供城邦所需之物品和服务的民众构成<sup>[11]128</sup>。柏拉图告诫说最好的公民一定不要从事艺术或技术活动，因为“每一种公民的职业都要求大量的实践和学习，在社会中建立和维护良好的秩序。这不是一种兼职。做两种生意或干两种职业——即便是做一种生意并再监督一个工匠——不符合人的本性。”<sup>[17]275</sup>

从事城邦组织和管理工作需要闲暇，需要将个人从谋生的必要劳动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从希腊的政治安排使小部分公民免于必要劳动这个层面来讲，有充足闲暇从事哲学和参与政治的意义上，柏拉图承认普通公民的劳动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在另一方面，柏拉图又以普通公民缺乏能力和闲暇为理由，否定他们有过高级的良善生活的自由和权利。在《泰阿泰德篇》中，柏拉图把人分为低等的和高等的两类。他说，为低等人准备的就是劳作的生活，而高等人“生长于自由与闲暇中”，过着真正幸福的生活<sup>[18]</sup>。柏拉图还极力贬责那些自以为能够从事哲学和认识真理的普通公民，他说：“许多不具完善天赋的人就这么被吸引了过来，虽然他们的灵魂已因从事下贱的技艺和职业而变得残废和畸形，正像他们的身体受到他们的技艺和职业损坏一样。”<sup>[11]246</sup>普

通公民不能取得善德，因为他们生性低劣，而劳作又进一步损害了他们的灵魂。这里，劳作与闲暇之间的差别就与柏拉图的身体—灵魂二分法巧妙地结合了起来<sup>[9]</sup>。在柏拉图看来，身体代表着不完善和低级，灵魂代表着完善和高级：“只要有形体，灵魂受到形体的累赘，我们就不能完全如愿以偿，获得真理。……最坏的是我们忙里偷闲关心哲学的时候，肉体经常闯进来用喧嚣和混乱打断我们的研究，使我们不能瞥见真理。”<sup>[19]219</sup>

柏拉图认为，体力劳动是公民进行理性思考、管理城邦等高级活动的障碍。他甚至提出：“如果一个土生土长的公民转而注意某种手艺，而不去培育美德，那么城市管理员就用羞耻和不名誉去惩罚他，直到他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sup>[17]275</sup>实际上，柏拉图也曾提到应当尽可能在城邦内分配闲暇，但这不会改变他对体力劳动和劳动者的态度。柏拉图指出惟有哲学家能够达于神明，因为“一个人如果并没有研究哲学，而且去时并不十分干净利索，是不能容许侧身于神灵的行列的，只有好学之士除外。”<sup>[19]243</sup>因此，闲暇、求知和充当政治领袖这些事情都为最好的等级保留着，其他的普通公民和奴隶只应支持和服从他们。

劳作与闲暇理论也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的核心组成部分。亚里士多德宣称：“幸福存在于闲暇之中，我们是为了闲暇而忙碌”<sup>[20]227</sup>，意即闲暇属于比“劳动的生活”更高层次的生活。在亚氏看来，那些以手艺和苦力为生的人们无缘完成他们的善德<sup>[21]127</sup>。亚里士多德提出，“（理想城邦）显然不能以从事贱业为生而行动有碍善德的工匠和商贩为公民。忙于田畴的人们也不能作为理想城邦的公民；（因为他们没有闲暇，而）培育善德从事政治活动，却必须有充分的闲暇。”<sup>[21]366-367</sup>亚氏还说：“在容许工匠入籍的城邦中，就不可能每一公民都具备既能被统治也能统治的良好品德，仅仅一部分不担任鄙俗的贱业的人们才具备这些好公民的品德。”<sup>[21]127</sup>由此看来，亚氏似乎认为应当把工匠划归奴隶之列。

在对城市的设计中，亚里士多德也主张应当有两个相隔离的广场。一个设在低处，是工人阶级的广场，可以进行商业买卖活动。另一个设在高处，是“自由人的广场”，专供休闲游息，“这里除经行政人员所召集的人以外，凡商人、工匠、农夫或其它类此的人们，一概不许入内”<sup>[21]379</sup>。在教育问题上，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闲暇应当成为教育的全部目的。“父辈对于诸子应该乐意他们受到一种既非必

需亦无实用而毋宁是性属自由、本身内含美善的教育。”那些使人从事具体业务的实用课目固然事属必需,而被外物所役,只可视为逐生达命的手段。亚氏还说“事事必求实用是不合于豁达的胸襟和自由的精神的。”<sup>[21]412</sup>

亚里士多德还构想了一种等级理论,即所有事物因各自理性和自由的程度不同而据有不同的位置。神在最顶端,完全独立并且永远致力于纯粹理性思考。人位于神和动植物之间。因带有自由和理性的神性特征,人类能以有限的方式经验神的无限的善德。亚里士多德确信:“(德性)是一种能力,能够提供和保存诸善,而且是一种可以在诸多事情或最重大的事情上,以及在一切方面的一切事情上带来好的效果的能力。德性的组成部分是公正、勇敢、节制、大方、大度、慷慨、和蔼、明智以及智慧。”<sup>[22]372</sup>虽则德性是能够带来好处的能力,人们善德的大小却是不同的,“本性更加贤良的事物的德性和业绩更为高尚,例如男子较之于妇女……不从事任何工匠的贱技是高尚的,因为不仰他人鼻息的生活才是自由人的生活。”<sup>[22]374</sup>由此,闲暇和劳作就成了衡量一个人是否具有善德的尺度。在亚氏看来,正像自然按等级孕育出了植物、动物、奴隶佣工一样,自然还创造出了以其理性和闲暇而有别于他人的德善之人。

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看来,劳作和闲暇构成了对普通劳动公民的一前一后两道屏障<sup>[9]</sup>。首先是缺少自由时间。劳碌的谋生活动,剥夺了普通民众取得良善生活所必需的自由时间。如果一个公民必须花费大量时间去收割庄稼、照看商店、服务顾客或听命雇主,他就无法参与城邦政治活动。一般地说,并不是劳作本身被认为悲惨,而是它所引起的这种从属和依赖。自给自足是希腊长期存在的价值观。当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曾褒扬过这些忠实的农民,说他们在传统雅典社会中是很重要的。然而,亚里士多德在其理想城邦中却把农民从公民中排除了出去。柏拉图把人的灵魂分为九个等级,农民的和匠人的仅列在第七位,只比诡辩派和僭主高些<sup>[23]</sup>。问题不仅仅在于缺少闲暇。如果缺少闲暇是阻碍普通公民取得善德的惟一因素,一个显而易见的补救措施就是对劳作与闲暇进行更加公平的分配。同其他贵族一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认为民众除缺少时间外,还缺乏以高贵的方式使用自由时间的有教养的人的品质<sup>[9]</sup>。希腊语 scholē(闲暇)一词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其一般意义指可以自由地做事情的状态,另外此词还进一步以比较或最高的

意义用做“不做次要而做更(或最)重要的事情的自由”<sup>[24]</sup>,亦即做重要的事情而不被低级的活动打扰。汉尼卡特说:“柏拉图确实认为只有少数人能够操持自由而免于必要劳动,大多数没受过教育的、鲁莽的民众必须进行劳作。由于经济上的穷迫,大多数民众不可能接受教育和脱离贫穷享有闲暇。”<sup>[24]</sup>

只有“真正自由的”贵族对于从事更为重要的闲暇活动是有思想准备的,因为他们接受过对自由的高贵的人的教育,使得他们适合于从事精神上的追求<sup>[25]</sup>。在贵族看来,工匠只为他们勉强维持生活的依赖性的专门技艺而受到训练,使得他们不适于操持闲暇。这种闲暇和教育观念所隐含的贵族立场在亚里士多德对音乐的论述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他将音乐视做自由教育和闲暇活动的关键方面,承认音乐作为消遣和娱乐对所有人都是有益的。然而,其最高尚的意义在于它对自由人的性格和灵魂所产生的影响。亚氏认为剧院上演的音乐应有两种类型,因为“听众有两类:一类为自由而夙有教化的人们,另一类为工匠、佣工等普通的俚俗听众。竞赛和观摩演奏不但应该让第一类听众入场,对于第二类听众也应该一律开放,他们正需要借以息劳解倦。这类听众的灵魂因困于劳作而丧失自然,他们就喜欢倾听偏异的乐调和缓急失常而着色过度的音节。”<sup>[21]431</sup>因此,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对普通公民以其有限的闲暇和狭隘的训练在自身和城邦内取得善德的可能性持悲观的看法。实际上,他们公开蔑视劳动群众。柏拉图说他们是“没有节制的”、“名义上叫做自由人”、“为数众多的下等人”<sup>[11]150-151</sup>,并把他们比做牲畜,由于贪婪而“用犄角和蹄爪互相踢打顶撞”<sup>[11]376</sup>;亚里士多德说民众过的是寄生的奴性的生活<sup>[20]7</sup>。这样一些描述并不是心平气和的,而毋宁说是带有根深蒂固的阶级偏见的。由雅典最著名的哲学家所发展起来的这种劳作与闲暇观念,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当时事变的政治性反应<sup>[9]</sup>。

雅典社会是建立在公开讨论基础之上的,因此普通公民很可能已经获悉了这些哲学家关于他们的某些言辞,他们作出了怎样的反应?据奥斯汀等的研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持有的这种劳作与闲暇观念反映了“贵族的价值观在总体上并未受到严重挑战”<sup>[26]</sup>。当然,也很难想象占人口大多数的普通公民会不加以任何反抗地顺从地接受这样一种非难斥责他们的社会思想。更可能的是,普通民众非常生气,至少对那些明确要降低他们的身份并要把他们排除出城邦的言辞。实际上,雅典确实有一项法律禁止对他人的职业进行毁谤,表明了贵族对劳动民众的

偏见和普通劳动公民对此所作出的明确反应<sup>[9]</sup>。唐伦认为尽管贵族的价值体系处于中心地位,但它并非不被质疑,“事实上,从一开始就不断有来自下层的压力,迫使贵族作出防守性的改变”<sup>[27]</sup>。

### 三、普通公民的劳作与闲暇观念

在希腊历史之初,劳作既被视做必需也被认为是美德<sup>[28]</sup>。荷马时代人们把农作看成是养成诚实和节制等优良品性的有益训练,手工技艺在社会上也很受尊敬。那时候贵族与普通民众同样进行生产劳作<sup>[29]</sup>。后来的赫西俄德——希腊农民的代表认为劳动是一种必需。他写道:“人类只有通过劳动才能增加羊群和财富,而且也只有从事劳动才能倍受永生神灵的眷爱。劳动不是耻辱,耻辱是懒惰。”<sup>[30]</sup>梭伦相信“没有一种行业会降低一个人的社会地位”<sup>[31]</sup><sup>167</sup>,他订立的一项法律就是要求父亲必须使儿子掌握一门手艺<sup>[31]</sup><sup>190</sup>。古风时代希腊人即已认可手工技艺是人类文明的基础和泉源。“赫菲斯托斯赞”歌颂道:“嗓音清越的缪斯,歌颂技艺高明的赫菲斯托斯,他与明目的雅典娜一同将精湛的技艺教给了地上的人们,而此前人们是居住在山洞里的,就像野兽一样。但他们现在已通过赫菲斯托斯这个名声卓著的工匠学会了技艺,可以轻松地整年都居住在自己的房子里过着平静的生活。慷慨些,赫菲斯托斯,给我智慧和财富。”<sup>[32]</sup>

考古发现表明,不少工匠对自己的技艺和劳动是引为自豪和骄傲的。例如,公元前7世纪的一个雕刻匠献了一座价值很高的纪念碑给阿波罗,上面刻写着“(希腊)纳克索斯岛人欧西卡提戴斯(Euthykartides)制造并奉献于我”<sup>[33]</sup><sup>10</sup>,公开宣布他在财务上的成功和对自己技艺的自信。前5世纪前半期,一名匠人把他的作品作为杂税奉献给雅典司掌手工技艺之神雅典娜,上面刻着:“手工匠人根据行业的需要不断提高他们的技艺水平是好事,因为有手艺的人能过更好的生活。这是给雅典娜的捐赠。”<sup>[34]</sup>来自希腊各邦的匠人还经常举行竞技比赛。逝于前370/360年的一个陶工的墓碑上刻写着:“在城邦举行的竞赛中,在那些制陶人中,希腊评判巴克契奥斯(Bakchios)在品德和成绩方面都为第一。他摘走了所有的桂冠。”<sup>[33]</sup><sup>209</sup>由于在古希腊刻写墓志铭的做法是很少见的,在铭文中还盛赞手工技艺就更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表明手工匠人在社会上已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进步,希腊人对劳动和技艺的赞美和尊重也在逐渐增加,这从对社会所有阶

层都开放的希腊戏剧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安提戈涅》中,歌词赞颂人的聪明才智说,“在技巧方面他有发明才能,想不到那样高明”<sup>[35]</sup>。埃斯库罗斯讲述了普罗米修斯从宙斯盗取火种给人类的故事,并说人类“可以用火学会许多技艺”<sup>[36]</sup>。可以说,对技艺产生场景作高度理想化的阐释,是从另外的方面称颂手工匠人对于社会的贡献。

伯里克利在其演说词中明确指出了劳动、参与政治和向善此三者是相容的。他说:“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让一个人负担公职优先于他人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某一个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们有的真正才能。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正因为我们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我们彼此间的日常生活也是这样的。”<sup>[8]</sup><sup>147</sup>伯里克利还说道:“至于贫穷,谁也不必以承认自己的贫穷为耻;真正的耻辱是不择手段以避免贫穷。在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所关心的,不仅是他自己的事务,而且也关心国家的事务:就是那些最忙于他们自己的事务的人,对于一般政治也是很熟悉的。”<sup>[8]</sup><sup>149</sup>

伯里克利描绘了一幅美好的城邦图景:所有公民都自由自在地生活,享受各种政治和社会权利;只要人们肯不懈劳动来摆脱它,贫穷就不是耻辱;普通公民关心城邦,能够胜任管理城邦的政治家角色,即使他们必须进行劳动。

我们再来看看贵族安多基德的事例。前399年,安多基德因亵渎秘仪和破坏赫尔墨斯石像而被指控。在性命攸关的审判大会上,安多基德对陪审团发表了演说,他说:“再仔细想想,如果你保护了我的话,我将会怎样看待你。正如你所知,我从前是一个富有的人。然后开始陷入极度的贫穷和困苦中,并不是由于我的过错,而是由于降临雅典的灾祸。然后我重新开始了生活,一种诚实的劳动的生活,用我的大脑和双手来帮助我。”<sup>[8]</sup><sup>144</sup>此处,一个贵族受害者向陪审团承认自己亲自劳动来克服贫困,如果劳作被大多数人看做堕落、有失身份和降低人品的话,安多基德当然不会这样说。

然而,由于闲暇学、历史学、哲学等领域里的诸多研究者主要依靠贵族哲学家的著作来理解劳作,这就使得他们认为蔑视劳作不仅仅是贵族的观念,普通民众也同样排斥劳作。而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为生存而劳作对大众来说是可以接受

的,并且有技能的工人在雅典民主政治制度下还得到了格外的尊重。正如布莱恩特所言,尽管贵族可能都赞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认为普通民众无法享有真正的公民权,但手工匠人自己并不认可“这些老套的毁谤”,农民也不接受“kakoi”(贵族用于指普通民众的贬义词)一类的侮辱性标签<sup>[37]</sup>。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工作至上”是不为人称道的。希腊语 Ponos(劳动)一词意味着费力、不愉快,与贫穷(penia)有着相似的词根<sup>[38]</sup>。所以,我们不能把希腊的劳作观与新教的工作伦理混同起来。希腊人生活的重心是城邦,而非劳作。

闲暇在雅典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如同伯里克利所说:“当我们的工作完毕的时候,我们可以享受各种娱乐,以提高我们的精神。整个一年之中,有各种定期赛会和祭祀”<sup>[8]148</sup>。这些活动包括戏剧、音乐、舞蹈、体育比赛和游行,所有公民都可以参加这些纯消遣性质的活动,私人也经常举行结婚、葬礼、聚会等各种庆祝活动<sup>[28]</sup>。雅典人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分发最低限度津贴的做法为普通公民参与政治提供了更多的闲暇。从提供闲暇和激励政治参与方面来说,奴隶主民主政治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制度保障,但它并没产生出一个完全有闲的公民集

体。艾伦贝格认为,为贵族政治理论所扭曲的希腊公民蔑视劳作的观点在现代讨论中又被极大地夸大了<sup>[39]</sup>。事实上,只有富有的贵族享有绝对的完全的闲暇。绝大多数公民都要亲自谋生,甚至经常与奴隶并肩劳作。

#### 四、结语

古典希腊劳作与闲暇观念是由贵族系统地进行阐释的,它包含了蔑视劳动的偏见,把劳动看作是自由、善德和公民权的对立面。必须亲自谋生的普通公民被贵族描述为能力低下的人,不适于追求自由和善德,应当把发展文化和从事政治的权力留给有闲的贵族。劳作与闲暇的分野由此成为贵族为应对民主制的压力而树起的一道屏障。这种贵族针对民主制的“侵犯”而采取的防卫措施,却被不少闲暇学研究者 and 哲学家作为文化层面希腊人对劳动的厌恶而传输给了我们<sup>[9]</sup>。闲暇的确是古典希腊人的文化理想,但劳动也并未被大多数公民视做奴性的、有辱人格之事。作为自由的两个层面,劳动与闲暇是相容的。事实上,普通公民接受了贵族的闲暇思想,并据此为其要求参与政治、文化等活动的闲暇。

#### 参 考 文 献

- [1] Mosse C. The Ancient World at Work[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1969: 113.
- [2] Kraus R. Recreation and Leisure in Modern Society[M].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0: 49.
- [3] Sessoms H. Leisure Services[M].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1984: 35-36.
- [4] 李仲广, 卢昌崇. 基础休闲学[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275.
- [5] 黄爱华. 劳动、闲暇与自由[J]. 哲学研究, 2005(5): 28-33.
- [6] 王国坛. 感性的超越: 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基础[M].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05: 237.
- [7] 周启迪. 世界上古史[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144.
- [8] 修昔底德.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M]. 谢德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 [9] Sylvester C. The Classical Idea of Leisure: Cultural Ideal or Class Prejudice?[J] Leisure Sciences, 1999 (21): 3-16.
- [10] MacDowell D. The Law in Classical Athens[M].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67.
- [11] 柏拉图. 理想国[M]. 郭斌和, 张竹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 [12] 亚里士多德. 雅典政制[M]. 日知, 力野,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57: 4.
- [13] Euripides. Suppliant Women[M]//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8.
- [14] Ober J. Mass and Elite in Democratic Athens: Rhetoric, Ideology, and the Power of the People[M].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287.
- [15] Wood E. Peasant-citizen and Slave: The Foundations of Athenian Democracy[M]. London, New York: Verso, 1988.
- [16] Raaflaub K. The Discovery of Freedom in Ancient Greece[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247-249.
- [17] 柏拉图. 法律篇[M]. 张智仁, 何勤华,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 [18] 柏拉图. 泰阿泰德·智术之师[M]. 严群,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3: 67-68.

- [19] 柏拉图. 裴洞篇[M]//柏拉图对话集. 王太庆,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 [20] 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科伦理学[M]//亚里士多德全集: 第八卷. 苗力田,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7.
- [21]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M]. 吴寿彭,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 [22] 亚里士多德. 修辞术[M]//亚里士多德全集: 第九卷. 颜一,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
- [23] 柏拉图. 斐德若篇[M]//柏拉图文艺对话集. 朱光潜, 译.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7: 122.
- [24] Hunnicutt B. Leisure and Play in Plato's Teaching and Philosophy of Learning[J]. *Leisure Sciences*, 1990 (12): 211-227.
- [25] Raaflaub K. Democracy, Oligarchy, and the Concept of the "Free Citizen" in Late Fifth-century Athens[J]. *Political Theory*, 1983 (11): 517-544.
- [26] Austin M, Vidal-Naquet P.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Ancient Greece[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17.
- [27] Donlan W. The Aristocratic Ideal and Selected Papers[M]. Wauconda, Illinois: Bolchazy-Carducci Publishers, Inc, 1999: 178.
- [28] Balme M. Attitudes to Work and Leisure in Ancient Greece[J]. *Greece & Rome*, 1984 (2): 140-152.
- [29] Applebaum H. The Concept of Work: Ancient, Medieval, and Modern[M]. Albany,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 20-21.
- [30] 赫西俄德. 工作与时日/神谱[M]. 张竹明, 蒋平,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10.
- [31] 普鲁塔克. 希腊罗马名人传: 上册[M]. 陆永庭, 吴寿彭, 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0.
- [32] Rayer D. The Homeric Hymns: A Translation,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95.
- [33] Burford A. Craftsmen in Greek and Roman Society[M].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2.
- [34] Dillon M, Garland L. Ancient Greece: Social 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from Archaic Times to the Death of Alexander the Great[M].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209.
- [35] 索福克勒斯. 安提戈涅[M]//悲剧二种. 罗念生,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12.
- [36] 埃斯库罗斯. 普罗米修斯[M]//悲剧二种. 罗念生,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1: 14.
- [37] Bryant J. Moral Codes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Ancient Greece: A Sociology of Greek Ethics from Homer to the Epicureans and Stoics[M]. Albany,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6: 113.
- [38] Standing G. Global Labour Flexibility: Seeking Distributive Justice[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Inc, 1999: 4.
- [39] Ehrenberg V. The Greek State[M]. London: Methuen & Co, 1969: 96.

## A Political Analysis of the Classical Greek Attitudes to Work and Leisure

WANG Yun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Industry, University of Jinan, Jinan 250022, China)

**Abstract:** Classical Greek attitudes towards work and leisure, formulated by aristocrats, were embedded in class interests and thus became a barrier erected against the pressures of democracy. However, what began as a defensive measure against the encroachment of democracy has been passed on to us by historians, philosophers and some leisure science researchers as a cultural antipathy toward work. Although leisure was a cultural ideal of Classical Greeks, work was not considered servile by the majority of the Greek citizens. Work and leisure were morally compatible.

**Keywords:** classical Greece; Athens; work; leisure; politicize

(责任编辑: 寇 甲)